



考古发现



元谋人发现记趣

最早的元谋人化石，是几位年轻的地质工作者在1965年五一节下午发现的。

那天，几位在云南省元谋盆地进行地质调查的年轻的地质工作者，得到当地一位牧牛老人的指点，来到那蚌村以西约1公里的山沟里寻找化石。约下午5点，其中一人在一个土包下发现了云南马的化石，随后又发现了两颗人类的门齿，后面的这一发现使这群年轻人激动不已，他们高兴得又唱又跳，举起随身携带的水壶，以水代酒，水壶相碰，庆贺这一令人振奋的发现。

经专家研究，这两颗牙齿属同一成年人的内侧门齿，距今约170万年。科学家命名这一人类为“元谋直立人”简称“元谋人”。

二十多年后的1986年和1988年，在这里又有了新的重大发现。这些新发现为人类的演化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化石资料。

1986年10月底，元谋县物茂中学初一学生、彝族姑娘李自秀在当地的豹子洞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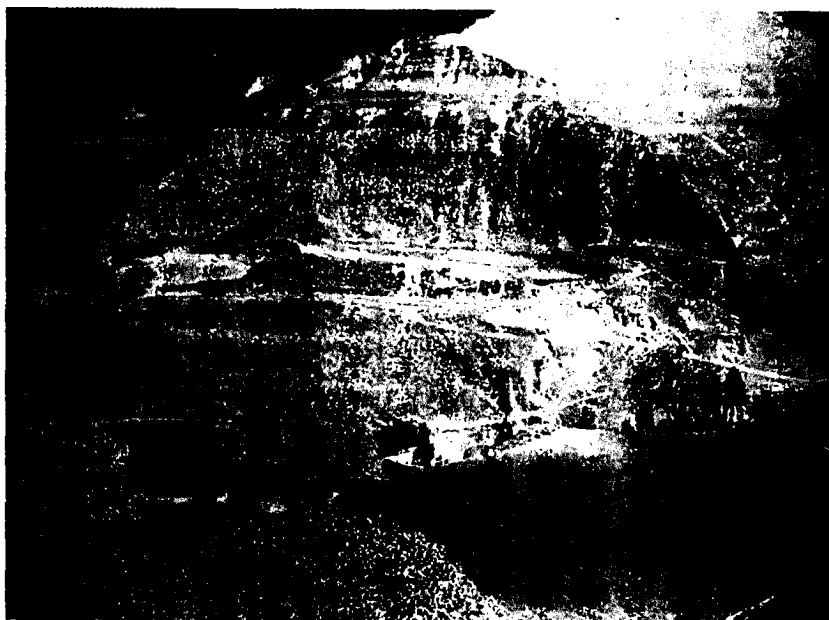
发现了重要化石。她和她的舅舅一起，将80公斤重的化石扛到昆明，交给了云南省地质矿产研究所的江能人工程师，江能人当即从化石中挑出了一颗人类牙齿，经考证，这颗牙齿距今约210万年，专家将这一人类命名为“东方人”。两年后的1988年，人们又在元谋县小河村地区的蝴蝶梁子出土了比“东方人”更早的人类化石，距今约270万年。化石中有一段左股骨，比现代人的略粗，从这段股骨可判断，当时的人类已能直立行走。专家将这一人类命名为“蝴蝶腊玛古猿”，认为“蝴蝶腊玛古猿”是东方人的直系祖先。这个结论将中华民族史推前了100万年。

我国西南地区，尤其是云南地区，是我国迄今所知最早的人类发展、演化的重要地区。考古学家还认为，“元谋人”北上越过金沙江，到甘肃、青海成为古羌戎人，继续往东北越过白令海峡进入美洲，成为印第安人的祖先。

蓝田人的化石是在室内整理出来的

1964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蓝田县公王岭发现了两枚人类牙齿的化石，这两颗牙齿同属一个青年男性个体。这一发现使

参与挖掘的人员兴奋不已，他们乘胜突击，终于发现了梦寐以求的人类头盖骨化石。当时，在场的人员都万分激动，生怕



公王岭遗址全景

大盆那么一大块时，一个猿人的头盖骨完全显露出来了。经专家研究，这是一个三十岁上下的女性个体的头盖骨化石。根据以出土地命名的国际惯例，这个猿人化石被定名为“蓝田猿人”。

现场挖掘碰坏了这一国宝，决定将化石堆积物运到北京去整理。他们将整堆足有800公斤重的化石堆积物装进大木箱运到北京，在研究室内小心翼翼地、一点一点地进行清理。

堆积物中有很多坚硬如石的钙质结核，当地群众称之为“料姜石”。考古工作者在这些“料姜石”中清理出了剑齿象、小古熊、大角鹿、剑齿虎、古野牛等各种动物化石。整理到最后，堆积物只剩下



蓝田人头骨化石

北京人是怎样发现的

1921年，当时任中国政府矿政顾问的瑞典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安特生到周口店调查。来到龙骨山时，他说：“有一种预感，我们祖先的遗骨就躺在哪里。”之后，奥地利古生物学家丹斯基果然在此发现了两颗猿人牙齿。

1929年，中国年轻的地质工作者裴文中和他的伙伴在龙骨山主洞附近的一个小洞中发现了一颗完整的猿人头骨，从而证实了安特生的预言。

那是1929年12月2日下午4时，洞内已一片昏暗，但他们仍舍不得离开小洞，继续点起蜡烛挖掘，突然，裴文中和他的伙伴在堆积物中发现了头盖骨，他高兴得喊了起来，大家迅速围拢过来，看着这梦寐以求的猿人头盖骨化石，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有人提议，立即将它挖出来，但也有人怕夜间挖掘损坏了国宝，主张天亮挖。但最后大家还是等不及，连夜小心翼翼地将其挖了出来。挖出之后，大家用棉被将它包起来，然后送到北京地质所。当时参与这项研究

工作的加拿大古人类学家步达生抱着这个头盖骨化石，激动地双手颤抖，差一点将头盖骨掉到地上。当他缓过神来后，又突然在头盖骨上亲吻了三次。经研究，确认这是一个少年男性北京人的头盖骨。在北京人的化石清单里，它被编为第Ⅲ号。

1936年，由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主持的发掘，又先后挖出三个北京人头盖骨。前两个是在1936年11月15日一天当中挖到的。一天之中连续挖到两个震惊世界的猿人头骨化石，这在世界考古史上是罕见的。当时参与这一考古发掘的外国专家魏敦瑞听到这一消息，兴奋得早晨起床找不到裤子，找到之后又穿反了。这两个头盖化石，一个属于成年男性，一个属于成年女性。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北京猿人胸像模型，就是根据这一女性头骨复原的。第三个北京猿人头骨化石是在前两个头骨化石发现之后的第十天发掘出来的，它是一个十分完整的头骨化石，属于一个成年男性。

河姆渡遗址是怎样发现的

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发现了处于母系氏族公社繁荣阶段的典型文化遗址——河姆渡文化遗址。

这座遗址的发现，纯属偶然，是当地人民修建排涝工程时发现的。

河姆渡是河姆村和渡头村的合称，位于风景如画的四明山麓的宁绍平原，流经平原的姚江将河姆村与渡头村一分为二。

1973年7月，红星大队接受了排涝站基础工程任务。因当时开镰割稻在即，工程日夜进行。开工后不久，发现地层下有些陶器碎片，再往下挖时，又陆续发现鹿角、象牙等物，这个情况引起人们的注意，逐级上报到有关部门。考古工作者很快赶到现场，经过考证，一处令世界震惊的古文化遗址得以确认。

河姆渡文化遗址约4万平方米，经过两次局部发掘，出土了大量文物，有许多重要发现。出土的骨、石、木、陶等文物达七千多件，许多文物，像象牙雕刻件、漆器、陶制艺术品，价值极高，堪称国宝。遗址中还有大量保存完好的稻谷和典型的木建筑房屋。这一切都说明，这里和黄河流域一样，也是我国古代文明的发源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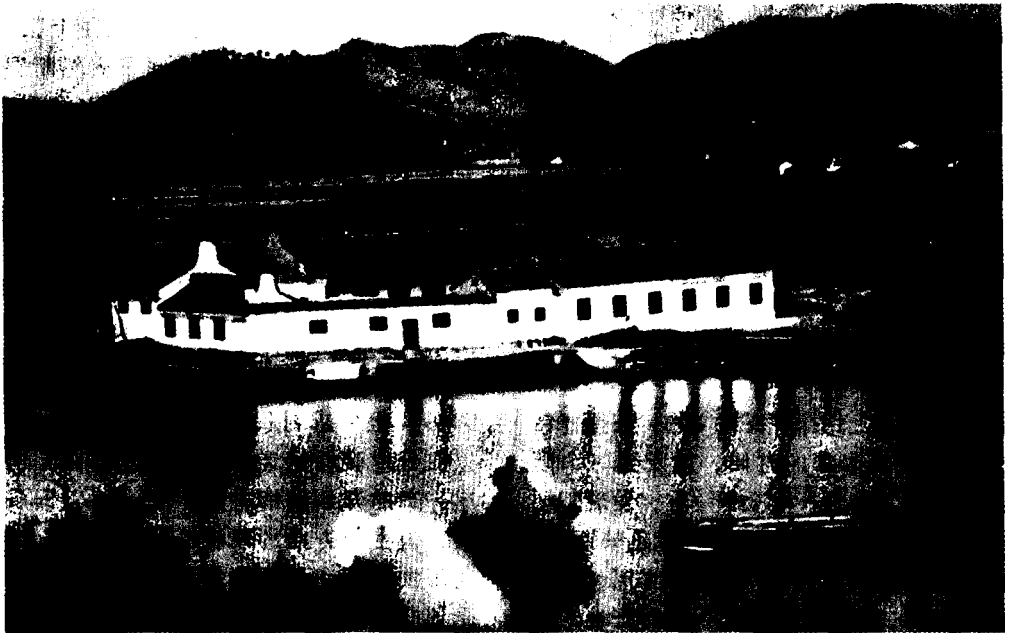
河姆渡文化遗址的发现，引起世界的关注。近几年来，已有二十多个国家、地区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官员前来考察。

1991年，国家决定在这里建立博物

馆。经过几年努力，河姆渡遗址博物馆于1993年5月12日落成并开放。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为博物馆题写了馆名。题字匾额长6.5米、高1.8米，悬挂在博物馆的正门上方。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为博物馆题写了“河姆渡遗址的发现，揭开了中华古文明史新篇章”的题词。

目前，有关部门正准备对河姆渡遗址做第三次考古发掘，并准备在那里再建一座发掘现场的纪念馆和原始部落村。河姆渡遗址不仅将成为人们领略和研究我国南方史前文明的重要去处，而且还将成为我国南方一处风格独特的旅游胜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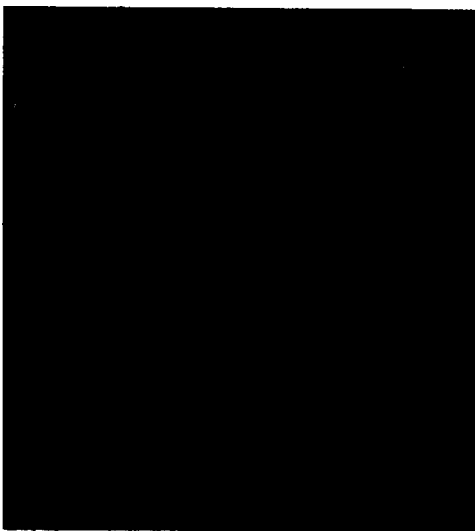
姚江之畔的河姆渡遗址博物馆

司母戊鼎是怎样发现的

世界上最大的青铜器司母戊鼎是1939年3月在河南安阳武官村北的农田中，被当地农民吴希增探寻到的。

自从安阳小屯村发现甲骨文之后，质朴的当地农民逐渐意识到殷墟文物的价值，于是积极参加了探寻文物的活动。

1939年3月的一天上午，吴希增在吴



司母戊方鼎

培文的田地上用探杆探找文物，当探杆钻到地下十多米深的时候，触及到一个硬物，吴希增将探杆取上来一看，发现坚硬的探头卷了刃，上面还留有绿色的铜锈，他意识到探到宝物了。按当地规定，探宝不分地界，但探出宝来，宝物所在地的主人要分得宝物售款的一半。吴希增和吴培文商定之后，当晚便破土挖宝了。挖掘工作是秘密进行的，到半夜时分，挖下约10米深，宝物被发现了，先挖到的是器物的

柱足，接着整个器物显露出来。当时，大方鼎的口朝东北，柱足朝西南，横斜在泥土里，大如马槽，但只有一个鼎耳，另一个鼎耳不知去向，人们在泥土中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找到。估计，它在埋入地下之前，便被击断失落了。

第二天夜里，吴希增组织了四十多人往上提，他们在洞口上搭了一个架子，用两条粗约五厘米的麻绳，一条拴住鼎耳，一条拴住柱足，一部分人在上面用力拉，一部分人在洞下用杠杆撬起一头并将土填入底部，然后再撬另一头，再用土填起来，用这种办法一点一点地往上抬，当提到六七米时，粗实的绳子突然断裂了。此时，天将放亮，为防别人发现，又将洞口堵了起来。到了第三天夜里，终于将这个特大方鼎弄出了地面。

方鼎的出土始终是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消息还是泄露了出去。不久，驻安阳机场的日军警备队长黑田荣次前来“参观”，后北平古董商萧寅卿也来秘密造访，并表示愿出20万银元购买，但要求村民将鼎砸成四至十块，以便分批装箱运走。村民受20万银元诱惑，真的开始肢解方鼎，先是用钢锯条锯，但由于方鼎的硬度高，没锯动，又改用铁锤砸，最后砸掉了鼎耳，使方鼎受到严重破坏。后来，村民认为把方鼎破坏了太可惜，还怕万一萧寅卿不要，不完整的方鼎会很难出手，于是村民停止肢解，又将方鼎埋入地下保存了起来。后来，消息传到日伪宪兵队耳中，宪兵

队多次前来搜寻。村民为了防止宝物被日本人抢去，便采取了迷惑敌人的办法——将方鼎转移到较远的地方埋藏起来，而在原来埋藏方鼎的地方，埋入了别的出土文物。日本宪兵找到这一埋藏地点，将这批文物抢劫而去，而方鼎得

以保存下来。抗战胜利后，方鼎被运往南京。解放后，又被运送到了北京，现珍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内。方鼎那失去的一只鼎耳一直没有找到，专家们仿照鼎上另一只鼎耳将它补铸上去，算是完整了。

司母戊鼎的制作和考证

司母戊鼎重875公斤、通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8厘米，这么巨大的方鼎是怎样制作出来的？过去，专家们认为，这么巨大的青铜器，只能是先分别铸制鼎身、鼎足、鼎耳各部分，然后再合铸为整体。但最近经有关专家分析研究，认为司母戊鼎仍然是用传统的浑铸法整体铸造出来的。铸造前，先用陶土塑模，然后翻范，范分腹范、顶范、底范和洗口范。范制好后，组合成铸型。司母戊鼎的鼎足是与整个铸型连为整体的。其中三个鼎足作为浇铸时的浇铸口，一个鼎足作为排气口。铸造时，将大型熔炉置于铸型鼎足的外侧，当熔炉中的青铜熔化之后，将铜汁从三个鼎足口的洗口范上慢慢往铸型里灌注，待鼎身铸好后，再在上面安模、翻范，浇注鼎耳。这样，巨大的司母戊鼎便

铸造出来了。

司母戊鼎是祭祀的器物，专家们已对“司母戊”三字做出了解释，即“祭祀母亲戊”。那么，戊是谁，又是谁的母亲？

1976年，考古工作者又在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遗址中发现了一对大方鼎，这是在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墓中发现的。这对方鼎称司母辛方鼎，通高80厘米，其形状与司母戊鼎十分相似，只是小了一点，鼎内所铭刻的文字的字体也与司母戊鼎的很接近，这说明司母戊鼎的年代应和妇好墓相距不远。据考证，武丁另一配偶恰是她戊。专家们以此推论，司母戊鼎所指的母，就是武丁之子商王祖庚之母——妣戊，司母戊鼎就是祖庚用来祭祀母亲妣戊的祭器。

谁是甲骨文的最早发现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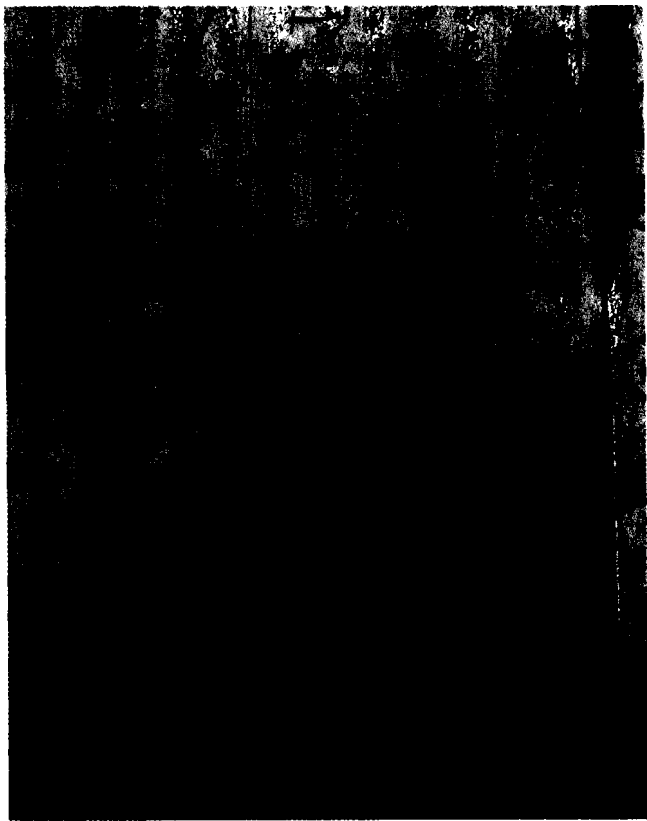
关于甲骨文的最早发现者，传统的说法是清朝北京国子监祭酒王懿荣，说他1899年因患疟疾在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的“达仁堂”中药店购买的中药中发现了刻有符号的“龙骨”，引起注意。

“龙骨”成为一种中药，据传与清朝

光绪初年的一位剃头匠李成有关。当时李成身患疮疥，无钱买药，便将河边的甲骨捡来碾成细粉，敷到疮上，没想到疮上的浓水很快被吸干了，疮也好了。李成很高兴，便又做了个实验，在手上划了道小口子，敷上骨粉，结果血也止住了。尤为神

奇的是，他把稻草濡以唾沫，横放在甲骨上，稻草竟慢慢转为竖向。于是这甲骨被神化了，称为“龙骨”。药店也开始把“龙骨”作为药材收购。

王懿荣发现“龙骨”上的这些符号，跟他正在潜心研究的铜器铭文很相似，他为此大为惊讶，于是把药店所有的“龙骨”都买了回来，经过研究考证，终于发现了甲骨文。“龙骨”上有文字，便成了一种文物，价格也因此暴涨起来，卖到每字白银2两。安阳小屯村从此掀起了争挖“龙骨”的热潮。王懿荣因此被认为是甲骨文的最早发现者。1931年北



殷墟甲骨文

京《华北日报·华北画刊》第89期汐翁的《龟甲文》一文，最早提出了这一观点。

其实，甲骨文在王懿荣发现之前，天津的王襄和孟定生就发现了。王襄字纶阁，天津人，对古文化很有研究；孟定生是当时天津的著名书法家。1898年，潍县古董商范寿轩来王襄家，谈到河南汤阴发现刻有符号的长条龟甲、兽骨等，这消息引起王襄和在王襄家的孟定生的重视。他俩揣度，认为这很可能是一种古简，要求范设法搞些来。

第二年，范寿轩果然带了一批甲骨来天津见王襄。王襄精心研究，认定甲骨上的符号是一种文字，并指出这种甲骨是商朝的卜骨，其文字是卜辞。范听说他搞到的甲骨上的符号果真是一种文字，于是将这批甲骨视为珍宝，索取高价。王襄和孟定生当时经济条件有限，无法将这批甲骨买下，只买了些碎片。后来，范去了北京，将大片甲骨卖给了王懿荣。王襄在其《题易秬园殷契拓册》一文中也记载了这个过程。所以，就此而言，最早发现甲骨文的当属王襄。当年王襄只有23岁。解放之后，王襄曾任天津文史馆馆长，1965年去世。王襄去世之后，其家属按照他生前的遗嘱，将全部甲骨和积稿献给了国家。天津市政府为表彰他的贡献，曾专门为他召开了展览会。

殷墟之外的三种甲骨文

殷墟甲骨文已为人熟知，它被证实是世界上一种古老的文字，中国现在使用的汉字就是由它发展而来的。然而，还有几种更古老、更奇特的甲骨文却鲜为人知。

一种是比较殷墟甲骨文还要早一千二百多年的甲骨文。这种甲骨文是陕西省考古工作者在西安市西郊斗门乡花园村原始社会遗址中发现的。这批甲骨文分别刻在一个骨竿、一颗兽牙和若干块兽骨上。从已清理出的十多个单体字来看，这种甲骨文字体细小，笔划细若蚊足，刚劲有力，字形清晰，字体结构布局严谨，与殷墟甲骨文字体接近。据专家考证，这种甲骨文的出土遗址属龙山文化晚期，距今约四五千五百年到五千年，比殷墟甲骨文要早1200年以上。

另一种是一批奇特的微刻甲骨文。这批甲骨文是在陕西岐山县周原凤雏村发现的，共有293片甲骨。甲骨上的文字细小如芥籽，笔划细如秋毫，需借助5倍以上的放大镜才可辨认，但字迹清晰、笔划刚劲流畅。书法分直笔和圆笔两种，直笔方直劲健，圆笔圆润婉逸。其中有一片甲骨仅2.7平方厘米，像小硬币大小，刻字面积仅1.7平方厘米，上面却刻有30个甲

骨文，其字细若发丝，个别的字径还不足毫米。这批甲骨文是西周时的作品，记载的多是西周灭商之后，周文王晚年到周康王初年的内容，但是，为什么要刻得这么小？是什么人用什么工具刻出来的？在古代尚没有放大显微技术的情况下，又是怎样辨认的？这些至今还是一个谜。如今，这批珍贵的微刻甲骨文收藏在陕西省岐山县文物管理所。

还有一种甲骨文是刻在陶器上的。这是1978年和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贵州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中水汉墓群中出土的一批陶器和陶片上发现的。上面共有51个类似象形文字却变化更为丰富的刻画符号。专家考证，这是目前贵州出土的年代最为久远的文字，距今约二千多年。因它的影响和意义可与殷墟甲骨文相比，此字又与彝文的发展有密切关系，故被学者们称为“彝族甲骨文”。

“彝族甲骨文”发现之后，许多专家和学者对它进行研究，但都没能破译。最近，贵州民族研究所的王正贤和贵州民族学院彝文研究室的王子尧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终于突破这一难关，成功破译了它。

战国时代留下的骷髅墩

在河北省易县易水河畔、原战国时代燕国都城下都遗址，有数十个高约十米、直径几十米的圆形夯土墩。千百年来，人们一直不知其来历，更不知墩中有何物。

最近，土墩部分夯土脱落，人们发现土墩中堆满了骷髅，一个土墩中竟有上千个，以此推算，易水周围几十个土墩中有数万个。骷髅中有完整的、有残缺的、

有破碎的，大多数布有刀枪砍杀痕迹，有的骷髅上还扎有青铜箭镞。据专家考证，这些青铜箭镞属于先秦之物。很显然，这是先秦时候一次战争遗留下来的。据一位学者说，这是战国时代“六国攻齐”战争中的“战利品”。公元前284年，燕昭王为报仇雪耻，联合了赵、魏、韩、楚、秦五国，组成了“六国联军”杀向齐国，接连攻下齐国七十多座城市，每天都从战场上押回大批齐军首级，堆积在燕国都城下都郊外。为了炫耀战绩，他们将堆积如山的

首级清点后，堆放到用芦苇围成的壕中，然后用土封起来，夯筑成土墩，再在墩上插满军旗，以振军威。

这一说法是否属实尚无定论，但这是一次大战役的遗迹，已为人们所认可。这是迄今人们所能见到的古代战争杀人规模最大的遗迹，对人们研究古代战争有重要意义。过去，人们只从史料上得知古代战争的残酷，能够亲眼看到这令人惨不忍睹的大批战争死难者的骷髅，使人相信史书所记并非夸张。

曾侯乙编钟出土趣闻

1977年9月，湖北省随州城郊擂鼓墩驻军、原武汉军区空军后勤雷达修理所在东团坡修建营地时，突然发现一片与地面颜色不同的“褐土”。该修理所副所长解德敏爱好考古，他认为这片异常土层下可能有古墓，便向随州县委做了汇报。

县里派了一位同志去察看，这位同志缺乏考古意识，没有给予重视，施工继续进行。到了1978年2月，施工人员在“褐土”层下发现了二米多长、一米多宽的长方形大石板，这一情况再次引起解德敏重视，也惊动了各级考古部门。3月份，湖北省博物馆考古队队长谭维四率勘察组前来勘察，认定“褐土”下是一个特大古墓，必有珍宝。经过发掘，一个东西长21米、南北宽16.5米、坑深13米、总面积220平方米的战国古墓展现在人们面前，墓内出土了一万五千余件稀世珍宝，其中65件青铜编钟最为珍贵。

说来令人震惊，如果不是懂点考古知识的解德敏及时反映情况，果断下令停

工，这座藏有千古奇珍的古墓就会毁于一旦。当时湖北省考古队来到工地时，发现部队施工打的炮眼距古墓顶层仅差80厘米，如果这一炮放下去，即刻就一切皆无了。

墓室内的发掘，也是险象环生。墓室打开，发现巨大的棺椁上盖有47块宽、厚均60厘米、长10.6米、重约四吨的盖板。开始，部队用5吨吊车起吊，吊不起来，后来调来了10吨黄河大吊车，才将这些盖板吊起来。椁盖板揭开之后，人们发现的不是地宫珍宝，而是一椁浑水，深约三米，水面上飘浮着破散的棺木。工作人员一边清理浑水上的棺木，一边往外抽水。随着水面的下降，三段横梁和一根木柱浮现在人们眼前。横梁下是何物，看不清。此时，一位年轻的考古工作者，勇敢地爬上跳板，顺着横梁往下摸，突然高兴地喊道：是编钟！我摸到了一排编钟！”这喊声令人惊喜万分，但此时，人们都没注意到横梁旁的那根木柱在轻轻地晃动。原来



曾侯乙编钟

这木柱是一个古乐器“建鼓”的支架，本来受水浮力支托，在水下耸立了二千多年，当积水渐渐抽去时，由于脱离了水的浮力，已经受腐蚀的木柱再也无法支撑建鼓自身的重量而发生折断。如果，当时能及时发现木柱晃动并采取保护措施，就不会留下这无法弥补的遗憾了。

后经专家考证，此墓处于地下水之下，埋藏后不久，水就渗透进去了，后来一直处在水的浸泡之中，正因如此，墓中的珍宝才二千多年没有受损，且保持着原来悬挂的样式。也正是因为有水，墓中珍宝才未被盗墓者窃取。考古工作者勘探时，曾发现一个直径80厘米的盗洞，此洞一直打到墓中室上方的椁板上，致使一椁板塌陷和泥土涌入。盗墓者打开棺椁，见

到的是一片浑水，既不知水下有何珍宝，又无法下水窃取。浑水终于使这座古墓免遭劫难，而给后人留下了这份无法估量的珍宝。

值得一提的是，墓中还有21名殉葬的年轻女性，经专家研究，21人中有曾侯乙的嫔妃8人，年龄在18~26岁之间；有曾侯乙的歌舞伎13人，年龄在13~20岁之间。这13个人的股骨与腿脚骨都比常人的发达，说明她们生前受过严格的歌舞训练，是曾侯乙的歌舞乐队。

曾侯乙45岁死去，生前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死后还想在阴间继续享乐，将大批乐器和嫔妃、歌舞演员陪葬，组建了他在阴间的歌舞乐队。

秦兵马俑是怎样被发现的

秦兵马俑成为世界第八大奇迹，是中国的国宝，但当人们未认识它时，却把它视为不祥之物。20世纪六七十年前，秦始皇陵东面宴寨公社的西杨村有一位农民打井，挖了好几天挖不出水，却挖出一个瓦人，像真人一样大小，他憎恨这怪物作弄他，就将这瓦人吊在一棵柳树上砸得粉碎。五十多年前，在秦始皇陵西面，一位农民在一米多深的地下发现了一个瓦人头和三个跪首瓦人，也没当回事，把它丢掉了。解放前夕，焦家村农民挖土时，又挖出了两个跪首瓦人，一个高0.72米，一个高0.78米，像泥塑的菩萨，农民们就盖了一个土地庙将其供奉起来了。

1974年，宴寨公社西杨村农民在村西南柿子园荒地上打井，当挖到3米深时，发现了红土层，大家认为是挖到了老砖窑，到了第五天，即1974年3月29日，在井筒西壁脚下，挖出一个“瓦盆爷”和大量陶片，围观的人们又要将其作为不祥之物处理掉，正在此时，文保员房树民赶到了，他看了看陶片，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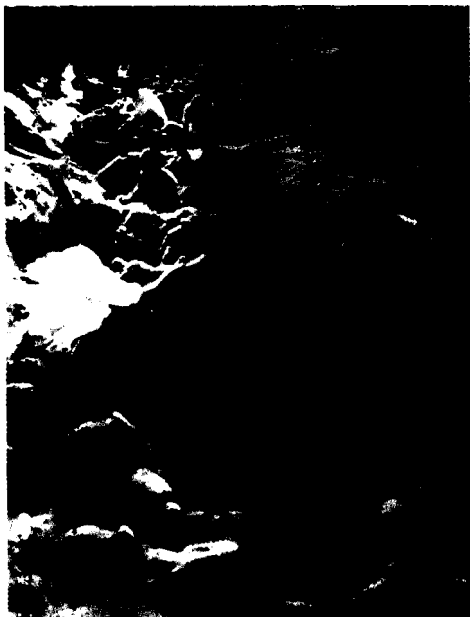
重要发现，他下到井里去察看，发现井下铺的是秦砖，而且这砖和5里外的秦始皇陵出土的秦砖一模一样。他上来之后，将这情况告诉大家，并对大家说：“这个井暂时不能打了。”房树民随即和县文化馆联系，请来了专管文物的赵康民等人。赵康民看后，激动地说：“什么瓦盆爷？可能是国宝。”并说：“如果是秦代的话，那就是千金难买了。”第二天，他们将陶俑碎片装满6辆架子车运到县文化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这情况没有向上汇报。有一次，新华社记者蔺安稳去西安，发现了这件事，写了一篇《秦始皇陵出土了一批秦代武士俑》的专文登在《内参》上，建议国家文物局和陕西省文物局注意这一情况。这事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文章刊登后的第三天，李先念就做了“建议文物局和陕西省委一商，迅速采取措施，妥善保护好这一重点文物”的批示。国家文物局立即组织力量进行勘察。就这样，震惊世界的奇迹出现了，秦兵马俑出土了。

发现秦兵马俑的农民成了名人

杨志发是当年抗旱挖井时，最早发现兵马俑的农民之一。后来有人写过一篇有关他的短文登在报纸上，但没有引起多大反响，杨志发依然过着朴实的农民生活。

1995年，秦兵马俑二号厅二楼开了个旅游品商店，年轻的经理冯东想起了杨发，把他请到店里做了“特邀嘉宾”，并

为他刻了一方“世界第八奇迹发现人”的印章，让他专为顾客签名加章、照像留念。人们听说这个店里有位秦俑的发现人，纷纷找上门来，要杨志发签名留念。杨志发的名声越来越响，找他签名照像的人越来越多。有一次，一大群日本人和美国人为赶时间找他签字，竟然用英语和日



秦始皇陵兵马俑发掘现场

语吵了起来。

1995年秋天，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参观完兵马俑后专门找到杨志发，听完兵马俑发现的经历后，大使紧紧握住杨志发的手，用流利的汉语说：“世界上很少有人能发现奇迹，你能发现秦兵马俑这个人类最壮观的古老文化奇迹，真是幸运！我们诚挚地祝贺你！”说完让随行人员取出一本画册请杨志发签名，并和他一起留影。

1996年元旦，上海一家电视台举行了一次“上海人最想见到的十个人”活动。杨志发被上海人选中，并被请到上海参加了元旦晚会的现场直播。

1997年3月，杨志发被日本德岛县日中友好协会会长森正邀请到他的家乡为专家学者介绍秦俑发现经过。抵达德岛

时，日本人举着五星红旗欢迎他，森正的几个孙子还为他献花，激动得他直流眼泪。他在德岛县做了两场报告，反应相当热烈。当地的电视台报社都赶来采访拍照，县政府长官也特地接见了她。

现在杨志发每天上午9点去商店，下午5点回家，每天要为三四百名游人签名合影，两年下来，估计有二十多万中外游客请他签过名或合过影，其中有些是外国政府的要员、名人。

杨志发这位朴实的农民，因发现秦兵马俑而成了一位知名人士。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沾了秦俑的光了。



秦始皇陵铜车马出土拾遗

在秦兵马俑发现6年之后即1980年，考古工作者又发现了秦始皇陵铜车马。这一发现再次震动了世界。

最早发现这一国宝的是考古工作者杨绪德。当时，他正在离秦陵封土20米左右的地方钻探，突然发现从7米深钻探带出的泥土中有一个手指大小的金泡。当他将金泡交给现场指挥程学华时，程学华十分重视，立即同他一起赶到现场，当钻探再次发现一个银泡和一片金块时，程学华激动了，激动得手都微微发颤。当又发现一块金丝灯笼穗时，他竟激动得“啊”地一声倒坐在地上——他知道人们苦苦寻找的铜车马找到了。他急忙带着出土器物找到馆长杨正卿，情不自禁地大声说道：“了不得了，陵园里发现了铜车马，如果发掘出

来，一定能震惊世界。”

发掘工作在专家的指导下，小心谨慎地进行着，经过近一个月的挖掘，奇迹终于出现了。在地下7.8米深处，2乘铜车、8匹铜马、2个铜御手显露出来。当时，人们兴奋地难以言状。第二天便带着照片赶去北京国家文物局报喜。报喜人员到达时，国家文物局正在开党组会议。局长任质斌得知后，立即走出会场听取汇报，当听完汇报、看过照片之后，高兴地猛拍了一下茶几，脱口而出：“太好了！这么伟大和珍贵的文物，怎么能不让世界震惊！”参加会议的文物局党组成员听到这一消息都兴奋不已，会议也因此停了下来。

铜车马显露之后，如何取它上来，专家们也颇费了一番心思，他们先在铜车马



1980年从始皇陵西侧出土的铜车马复原图

四周挖出几条深达10米的宽沟，用木板将铜车马连同1米多厚的土层包裹起来，组成4个大型木箱。然后，将一个特制的特大的钢板簸箕用吊车放入坑中，用千斤顶将钢簸箕一点一点地从铜车马的底层顶进去，使整个木箱进入簸箕，最后用吊车将夹裹着铜车马的木箱吊起来装入载重汽车的挂斗，小心翼翼地运往秦俑馆。

铜车马的整理修复工作是在秦俑馆进行的，经过了近两年的修复之后才开展

出。铜车马一亮相就轰动了世界。铜车马的大小是实物的二分之一，其设计之精巧、制作之精美、工艺之高超，无以伦比。其工艺制作方法，有的至今还在应用，有的至今还是一个谜。

人们在展厅中看到这雍容华贵、气势非凡的大型彩绘铜车马，就仿佛看到了当年秦始皇车辚辚、马萧萧地万里出巡的壮观场面。

汉代墓葬玉衣的发现

196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支施工部队在今河北省满城西南一座叫陵山的石灰岩小山上，发现了一座巨大的洞穴式崖墓。崖墓容积约三千立方米。这一发现引起人们的极大重视，周恩来总理批示迅速进行发掘清理，考古专家郭沫若亲临现场。经过发掘鉴定，确认这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墓。刘胜是汉景帝刘启的庶子，公元前154年被封为中山靖王，在位42年，公元前113年2月死去。这墓是效法汉文帝刘恒采用以山为陵的方法营造的。汉代盛行夫妻合葬，所以专家推测在刘胜墓附近，应有其妻子的墓。后来，果然在刘胜墓地北面一百多米处，找到了第二座墓，墓中有一颗双面刻字的铜印，一面刻“窦绾”二字，另一面刻“窦君须”三字。据此，专家们判定这就是刘胜妻子窦绾的墓。

在这两座墓中，各出土了一套金缕玉衣，其结构除上衣的前片和后片略有不同外，其它部分基本相同。刘胜的玉衣形体肥大，全长1.88米，由2498片玉片和1100克金丝连成。窦绾的玉衣稍小，全长1.72米，

由2160片玉片和700克金丝连成。两件玉衣的头部，都有用玉制成的眼盖、耳瑱、鼻塞和口琫。下腹部还有生殖器罩和肛门塞。

玉衣最早称“鳞施”，是施玉于死者之体如鱼鳞的意思；后又称“玉匣”，是汉代皇帝和贵族的葬服。编制时，按等级分别使用金丝、银丝和铜丝，故又有金缕玉衣、银缕玉衣和铜缕玉衣之称。玉衣的使用级别，西汉时不甚严格，到东汉时严格起来，只有皇帝死后才能用金缕玉衣，诸侯王用银缕玉衣，大贵人用铜缕玉衣。古时候，人们认为玉为大地之英、人间之精，入地与人相伴，能保人肤色不变，躯体不腐。事实证明，玉衣没有这种作用。刘胜夫妇出土时，玉衣内的尸体早已腐烂，窦绾只剩下8颗牙齿和一点骨渣，刘胜只留有一点骨渣。

玉衣的制作十分复杂，需要较高的工艺水平。它要经过造型设计、玉石加工、金丝、银丝、铜丝编结等手续。据现代经验丰富的玉石工匠说，要生产一



1968年发现的河北满城汉代墓葬玉衣

套像刘胜、窦绾这样的金缕玉衣，一个熟练的玉石工匠也要用 10 年之久。

1995 年，在徐州狮子山楚王陵也出土了一件金缕玉衣，这件金缕玉衣较满城那件更为精美，是迄今为止出土年代最早、

玉质最好、工艺水平最高的一件玉衣。通常玉衣是用二千一百多片玉片制作而成，而徐州狮子山楚王陵这件竟用了四千多片。玉片均为质量上乘的和阗白玉，玉片晶莹剔透，温和润泽，堪称绝品。这件金缕玉衣的主人是曾参加过“七国之乱”的楚王刘戊。它现存徐州市博物馆。

徐州是两汉文化较为集中的地方，曾多次发现两汉玉衣，不仅有金缕玉衣，还有银缕玉衣和铜缕玉衣。1970 年，在徐州土山汉墓出土了一件银缕玉衣，玉衣共用二千六百多片玉片制成，保存完整。1996 年，徐州火山汉墓又出土了一件更为完整和精美的银缕玉衣。1985 年，在徐州云龙湖南岸的拉犁山汉墓发现了一件铜缕玉衣。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趣闻

长沙马王堆汉墓是 1971 年湖南军区一个医院挖掘地下病房时偶然发现的。

当挖掘进行到地下十几米时，施工者发现了又细又软状如面团的白膏泥，遂停止挖掘，改用钢钎向下打眼钻探。当一个战士将钢钎从白膏泥中抽出时，钻孔中冒出一股呛人的气体，此时，正在洞内的一位干部划火柴点烟，引燃了这股气体，大家急忙跑出洞外，但这位干部还是被烧伤了：眉毛被烧焦，脸上也烧起了小泡。被点燃的气体发着蓝中带红的火苗，像一条扭动的蛇一样燃烧着。当时正处备战时期，医院领导怀疑发现了敌情，部队马上派出一个排的工兵携带排雷仪器前来勘探，结果没有发现炸弹之类的危险物。有

人想用水浇灭火焰，但水泼上去却被强大的气体压力反喷出来。最后，用泥袋堵住钻孔，才将火焰熄灭。

经专家实地探察，初步确定被挖的地下是一座古墓。挖掘过程中，曾发现 3 个盗洞，其中 2 个呈方形，1 个呈圆形。一位参加这次发掘、过去曾从事过盗墓而且经验丰富的师傅说，盗洞是古圆近方。那个圆形盗洞是古代盗墓者留下的，时间在元朝以前。那两个方形盗洞是近代盗墓者留下的。这位师傅后来说，其中的一个方洞就是他盗挖的，因墓太深，当时挖了很久没有结果，认为是一个疑冢，便放弃了。后来看到出土了那么多珍宝，他还有点后悔呢。

古墓发掘过程中曾发生过二次险情，一次是战士挖洞时，出现了塌方，几名战士被埋到洞内，多亏医院抢救及时，才得以脱险。另一次险情是在下挖十几米后，墓穴即将显露，指挥发掘的博物馆馆长急于求成地要打开墓穴，没有考虑雨后土层松动的危险，结果被一块突然塌下的土层埋了起来，当被抢救出来时，已是口鼻流血，不省人事了，后经抢救方才脱险。

墓穴被打开后，人们发现，周围包有1.3米厚的白膏泥，白膏泥下面是厚厚的木炭，约有一万多斤，装了整整4卡车。挖出的木炭和现在的木炭一样能够燃烧得很旺，因此被当地的老百姓拿去了不少。木炭取完之后露出了棺椁，棺椁上铺着26张竹席。刚出土时，竹席颜色嫩黄，光亮如新，但露出之后仅十几分钟便神奇般地

变成黑色的朽物了。墓中有四层套棺，外面的大椁长6.7米、宽5米、高2.8米，这个大椁是用52立方米的木材做成的。

开棺是在湖南省博物馆进行的。当时挤着看开棺的人很多，当棺盖打开之后，里面冒出一种非常强烈的酸臭气体，观看的人都用手帕捂鼻子，而手帕三天以后还有味。

后来，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每天高达6万人，一些外国专家和旅游者也赶来看二千多年前的“贵妇人”。拍电影、搞科研做切片的也来了。当时，单是维持秩序的就有一二百多人。博物馆周围的铁丝网都被人踏平了，门窗玻璃也被挤碎了。一位老太太被碎玻璃划破了胫间血管，险些送了命。最后，尸体被转移到湖南医学院一处秘密的地方，白天上锁，连研究人员也要晚上12点以后才能进去。

“马踏飞燕”铜奔马是怎样发现的

被定为中国旅游图形标志的铜奔马，从出土到被发现都很偶然。

在甘肃省武威市北门外，有一个又高又大的土台，因土台上建有雷神庙，所以土台被称为雷台。1969年，当地农民在雷台附近挖战备工事，他们在一棵三人才能抱过来的老槐树下，偶然发现了一座古墓。这是一座大型的东汉晚期的砖石墓，从墓中发掘出一批铜奔马，共39匹。出土之后，几个农民将其装入三条麻袋之中，送到村库房保存起来，不久又将它们送到甘肃省博物馆。当时，它们并没引起人们的重视。

1971年，著名学者、考古学家郭沫若

到甘肃省博物馆参观，在39匹铜马中看到这匹铜奔马，他惊喜地说：“它是这批文物中的宝中之宝！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就是拿到世界上去，都是第一流的艺术珍品！”不久，铜奔马送到北京博物馆展出。敦煌学研究专家常书鸿看到铜奔马之后激动地说，这正是他和徐悲鸿20年前谈论要找的一件珍贵文物。原来，1951年他和徐悲鸿谈论壁画艺术，他们从敦煌壁画中的马谈到法国画马名家吉利古尔的马及世界各国的画马。他们认为，这些古今中外的画马，都没能创造出“天马行空”的理想神态。徐悲鸿指出，画马的难处在于，不但要画出马的神速，还要画出马的烈性，